中日应急对译词汇库的构建设想
——以新冠疫情语境下的中日词汇对译为例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孙成岗　　吴　宏

[摘　要]　重大突发事件构成的语境往往给词汇的概念意义以某种调节，赋予其一定的关联语义或情景语义。本文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简述疫情应急中日对译词汇库的构建原则，将相关词汇放到疫情构成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分析因疫情产生的语义变化，探讨基于疫情语境的词语翻译策略，以期为今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迅速构建应急中外对译词汇库提供例证和借鉴。

[关键词]　新冠疫情　应急词汇库　中日对译　构建设想

引　言

2020年初，我国武汉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此次疫情持续时间长、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パンデミック」。面对如此严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就更需要国际社会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唯有如此，才能最终战胜病毒，取得抗击疫情的彻底胜利。

中国是最早报告疫情的国家，也是疫情防控阻击战最早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国家。及时准确地向世界通报疫情，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对于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抗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最早报告疫情并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将我国艰苦卓绝的防控工作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不仅有利于科学家对病毒溯源的研究，也有利于回击个别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兜售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谬论的政治谎言。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工作不可或缺。为减少翻译失误，实现信息准确传递，构建相关领域的应急对译词汇库、并不断完善修正，就显得尤为必要。

为此，在“武汉封城”的第4天，我们紧急制作了《新冠病毒相关词汇中日对译100词》，后经扩充、修正，最终形成了一个约500词的对译词汇库。词汇库先后发布在多家公众号上，人民网日文版公众号分3次连载了其中的199词，各公众号累计阅读量近10万人次。在央视播出的中国驻日使馆邀请张伯礼院士答疑的线下翻译、中日儿童新冠病毒感染经验交流视频会议的翻译、以及上海志愿者给在沪日本侨民做防疫工作的过程中，该词汇库为应急翻译人员和相关志愿者提供了助力。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全球性公共事件，需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进行应对。在这一过程中，应急语言保障不可或缺。突发事件往往给语言生活带来大量应急性新词或生僻词汇，构建相关应急词汇库，分析它们在翻译过程中的词义差别，对于保持术语一致性、准确性、提高翻译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新冠病毒相关词汇的中日对译词库的构建，在该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所收录的词汇基本满足了信息获取、学术交流之需。本论文就相关应急对译词汇库的构建原则、翻译策略、术语语义辨析等做一些回顾性探讨和总结，以期为今后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迅速构建应急中外对译词汇库提供例证和借鉴。

1 新冠疫情应急对译词汇库的构建和词汇翻译原则

1.1 词汇库的构建原则

构建新冠疫情应急对译词汇库的主要目的是为应急语言保障人员及外语学习者提供必要最小限度的相关词汇，使其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该领域的无障碍、专业化交流。因此，应急对译词汇库的构建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一是应急性与时效性。

新冠疫情的暴发具有突然性，且引发疫情的病毒属于新型病毒，人们对其知之甚少，随着疫情的蔓延，相关报道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相关词汇不断涌现，一些概念和名称也因人们认识的加深出现前后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因此词汇库的构建首先要速度快，满足应急之需。其次要动态管理，及时增容，补充新词。再次要实时跟进，更新重新定义的概念和新的表述。

二是针对性和实用性。

所选词汇必须实用，因此在词汇筛选时，把中日两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语料来源，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日本NHK关于疫情报道的新闻中选取高频词汇作为候选词，确保词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收录中文热词，也收录日文热词，体现互译性。

三是突出重点，坚持少而精，避免大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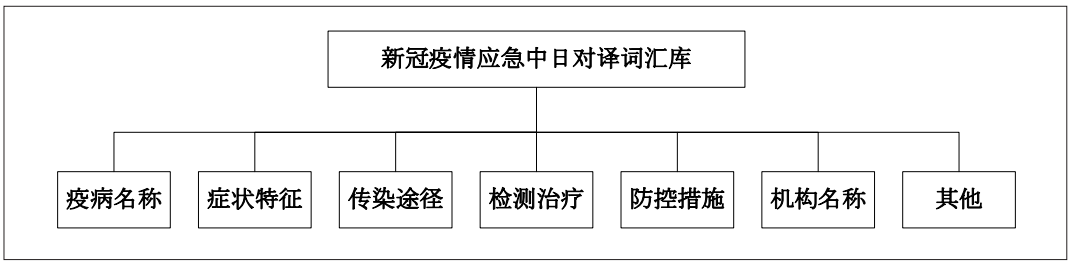
新冠疫情相关词汇涉及领域极广。不仅包括“发烧、乏力、干咳「発熱、倦怠感、空咳」”等描述新冠肺炎典型症状的词汇，也包括“流感「インフルエンザ」、埃博拉出血热「エボラ出血熱」、非典「ASRS＝新型肺炎」等既往感染症的名称，还有“飞沫传播、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医院内交差感染、人传人「飛沫感染、接触感染、エアロゾル感染、院内感染、人から人への感染」”等感染途径、以及“密切接触者、病患筛查「濃厚接触者、患者のスクリーニング検査」”等流行病调查相关词汇。另外还有很多新词以及过去不为常人所知的专业术语，如“人体测温热像仪/红外线热像体温仪「サーモグラフィー」”“体外膜肺氧合系统/人工肺/叶克膜「体外式膜型人工肺装置/ECMO/エクモ」”“封城「ロックダウン」”“三密「密封、密閉、密集」”等。

为此，词汇采集不宜面面俱到，所收词汇必须紧扣病毒特征和疫情防控两大主题，将描述同一事项的词汇进行归类，构成若干词群，以方便记忆和查阅。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将相关词汇分为七大类，以期达到提升应急翻译效率、提高应急翻译准确性之目的（见图1）。

1.2 词汇翻译原则——在疫情语境中考察词汇意义

学术界关于翻译的定义很多。根据《现代汉



注：作者依据相关词汇分类绘制。

图1 新冠疫情应急中日对译词汇库结构图

语词典》的解释，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1]”。许钧指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2]”。从以上解释可以看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其典型特征就是语际间“意义”的转换。尤金•奈达早期根据描写语言学的观点把意义分为“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3]”，后期又从词汇、语法、修辞三个层次考察了产生“意义”的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刘宓庆把“意义”放在交流中考察，他认为“意义”包括“概念意义、语境意义、形式意义、风格意义、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4]”。从上述定义来看，虽然翻译是语际间“意义”的转换，但“意义”本身的多样性和影响“意义”产生因素的多重性，决定了“意义”不是静态的。这种把意义放在动态体系中进行考察的观点，对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构建中外应急对译词汇库，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就词汇而言，通常情况下，作为词汇核心的概念意义或所指意义是相对稳定的，词与词之间的关联度很小，构成一个静态体系。但是，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描述该事件的词汇便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独立个体，它们往往构成互相关联的词汇集群。重大事件下的语境会给集群中词汇的概念意义以某种调节，赋予其一定的关联语义或情景语义。倘若重大突发事件涉及多个国家，文化的“多棱镜映象”又会使不同文化圈的语言在描述同一个事物或概念时，使用包含自己文化信息的文化负载词。因此，在构建应急对译词汇库时必须要考虑到语境因素，将相关词汇放到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在充分把握其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之上，选择适当译词，最大限度做到等值或等效，为重大事件中的各种口译和笔译活动提供基础支撑。

2 疫情衍生的新词翻译

新词是伴随新事物的出现而产生的，它的构词方法通常有新造、转用、借用等。

2.1 新造语的翻译

新词因为其“新”，往往具有不稳定性，所以对于此类词汇的译词也要随着它在原语中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现象到本质。当一个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由于人们对其不了解，所以在表述时通常比较繁琐。在翻译时，这种现象则更加明显，由于没有相应的准确译词，为了防止语义流失，故常常使用多个词汇进行描述性翻译。

此次疫情中关于疫情名称的确定与翻译就是如此。去年年末，医学界对该病毒一无所知，因此，武汉市卫健委在通报中先后使用了“肺炎疫情”“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等表述，在初步判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型肺炎”，最终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国际上对新冠病毒的命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病毒名称暂定为“2019-nCoV”，之后根据疾病的命名应与地名、动物无关的原则，于2月11日将其正式命名为“COVID-19”，其中“CO”指「コロナ」(corona)(冠状)，“VI”指「ウイルス」(virus)(病毒)，“D”指「疾患」(disease)。「COVID-19」在日语中既可读成「コビッドじゅうきゅう」也可读成「コビッド・ナインティーン」。

相关词汇在译成日语时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明到明确、由繁琐到简单的过程，具体如下：

肺炎疫情：「肺炎の感染状況」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原因不明の肺炎/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る肺炎」

新型肺炎：「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よる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肺炎/COVID-19」

其中，“新型肺炎”并未采取直译的方法将其

译成「新型肺炎」，因为「新型肺炎」在日语中一度专指“非典（SARS）”，直译容易使译入语的受众误解，但也做了简化处理，去掉了上一种译法中的「引き起こされる」，译为「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よる肺炎」。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加深，表述则更为简练，去掉了「による」，直接译成「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肺炎」。在口语中，「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则有时简称为「新型コロナ」或者「コロナ」，由此产生了一些关联词组，比如「コロナ疲れ」（疫情防护导致的疲惫感）、「コロナ鬱」（疫情防护导致的忧郁）、「コロナ禍」（新冠之灾）、「アフターコロナ」（后疫情时代）等。

2.2　转用词的翻译

所谓转用，就是给既有词汇赋予新义，使之表达一个新的概念。此类词语在表示原有概念时已经有了相应的译词，但转用之后，原有译词已经无法满足表示新语义的需要，所以必须寻找新的译词。

比如“方舱医院”，它原本指军队具有较强机动性的模块化野战医院，过去鲜为人知，此次疫情使它成了热词。现代野战方舱医院共有医疗、病房、技术保障3个模块，通常由21台医疗方舱、26顶卫生帐篷和2台发电挂车组成。也许最初的方舱是用集装箱临时搭建的，故译为「コンテナ病院」。但此次武汉的方舱医院都是利用展览馆、体育馆等固定设施临时改建而成，并不具有可以快速移动的机动性，因此，使用「コンテナ病院」这一译词就比较牵强。根据其“不可移动、临时设置、应急医疗”等特点，此次武汉所建的“方舱医院”可译为「臨時病院」或者「仮設病院」。由于「仮設病院」的外延较「臨時病院」更广，不仅包括利用体育场馆等设施改建的“方舱医院”，也包括“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等突击建成的医院。因此，此次疫情期间的“方舱医院”选用「臨時病院」这一译词更符合它的特征。

2.3　借用词的翻译

所谓借用，就是借用方言词汇、外来词汇或其它专业词汇来表达某种语义。某些外来词虽然已经归化，语义相对固定，但在某些特定场合，它们可以被借用来表达新的概念。这种借用换个角度理解，似乎也是转用。从这层意义来说，借用与转用无法截然分开，两者只是侧重点不同。日本防疫专家给日本政府的政策建议中出现的「クラスター」「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ロックダウン」3个词基本属于借用范畴。

「クラスター」（cluster）原本是量词，指人、动物或者同类事物聚集的一个簇或一个群。在计算机术语中，它表示若干扇区组成的一个储存单位——簇。日本防疫专家在给日本政府的政策性建议中把被一个感染者传染的一群人称为一个「クラスター」，意思是“感染群”。根据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如果能够跟踪到这些感染群，就能够有效地控制住疫情。也许是基于这一考虑，原本为量词的「クラスター」被转用为名词。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クラスター対策」一词就是“防止出现聚集性感染”之意。这种转用实际上也体现了转用者的抗疫思路。

「オーバーシュート」（overshoot）的原意是“超过预定地点、超出原定计划或突破预定费用”。通常情况下，只要措施得当，疫情是可控的。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的未知性，它的发展有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想，出现大面积流行。因此该词被转用为「感染爆発」，意思是确诊病例骤然增加，出现疫情大流行，故可译为“感染暴发性增长”或者“感染集中暴发”。

「ロックダウン」（lockdown）的原意是“禁止犯人走出牢房”，可译为“监禁”。作为其派生含义，也指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隔离、限制出入等措施。早在1月23日，我国政府暂时关闭离汉通道「武漢市外に通じる交通ルートの閉鎖」，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封城”，这一措施对控制疫情的蔓延起到了巨大作用。“封城”一词当时被译为「都市封鎖」「武漢封鎖」，这种译法也为日本媒体所用。3月，日本专家在政策建议中用「ロックダウン」一

词代替「都市封鎖」，这种转用当时也许隐藏着一些特定的含义，但从后来的使用情况来看，它与「都市封鎖」的语义几乎是相同的。

3 特定概念性词汇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3.1 概念性词汇的翻译

以特定事件为大语境的概念性词汇，其外延与内涵往往受到限制，由过去的泛指变为特指。有时在一种语言中，这些特指与泛指依然使用同一词汇。但在另一种语言中，语义受限后的特指可能就要变成另一词汇，至少形态上要有所变化。还有一些词汇，虽然表达的概念与过去是相同的，但在大语境中它们变成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缩影，承载了值得人们铭记的内涵。这类词语尽管在翻译实践中译词与过去无异，但了解它们所承载的重要信息，对于准确翻译也是大有裨益的。

3.1.1 语义受限的概念性词汇的翻译

在疫情防控中，保持“社交距离”非常重要。“社交距离”一词，原本指日常交往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的心理上可以接受的距离。该距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它因双方关系的远近可长可短。关系近，距离就短，如果关系远，靠得太近，心理上就会感到不适。但在疫情防控这个大语境下的“社交距离”，则要求人们在不得已聚集时至少必须保持1米以上的间隔。它的语义由心理距离变为物理距离，从数值的不固定变为固定。尽管在汉语中，这种变化是通过上下文或语境来区分的，但在日语中则需要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心理上的“社交距离”是「ソーシャル·ディスタンス」，而疫情防控中的“社交距离”则是「ソーシャル·ディスタンシング」。这种语义上的区别过去只出现在专业性文章中，此次疫情使它从学术用语变成生活用语。为了使两者的区别更加明确，达到更好的防疫效果，世界卫生组织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フィジカル·ディスタンシング」，直接翻译就是“物理距离、肢体距离、身体距离”。有了这个新造词后，我们在翻译防疫上的“社交距离”时，至少有「ソーシャル·ディスタンシング」和「フィジカル·ディスタンシング」两个选择。

3.1.2 承载特定信息的概念性词汇的翻译

疫情产生的大语境，使原本一些非常普通的概念也具备了特定的含义。尽管这些伴随疫情产生的附加语义在疫情之后会消失，但它们在特定时期承载的特定事件的信息，也应是语言工作者的研究对象，掌握这些词汇的伴随意义对于应急语言翻译极具重要意义。

就此次使用频率较高的“疫情”一词而言，按照字典的解释，可译为「疫病の発生状況」，但通过对日文网站的检索，发现并无此说法。“疫情”原本指各种传染病造成的大流行，但此次所说的“疫情”，其内涵受到限定，特指“新冠病毒感染”的蔓延。因此，“疫情”就可以翻译成「感染」，“疫情蔓延”译为「感染拡大/感染の蔓延」，“抗击疫情”译为「感染対策/感染との闘い」，“疫情防控”译为「感染の封じ込め/感染の防止/感染の抑制」等。

另外，有些词汇的附加语义是随着抗击疫情方式方法的变化而产生的。比如“临床诊断「臨床診断」”与“影像诊断「画像診断」”。这两个词本来只是普通医学术语。所谓“临床诊断”就是根据患者临床表征确定疾病的性质，而“影像诊断”则指通过X光片或CT影像进行病症的诊断。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这两个词的语义开始趋同，被赋予了“新冠肺炎诊断标准调整”这一新内涵。在医学领域，区分新冠肺炎与普通流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进行核酸检测。随着疫情的加重，武汉地区疑似病例存量过大，而核酸检测用时较长，致使部分疑似病例无法确诊并得到集中收治。因此，2月4日晚，国家卫健委公布了第五版诊疗方案「第５版の診療ガイドライン」，规定在湖北省“诊断标准「診断基準」”中，加入“临床诊断「臨床診断」”标准，把“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也作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该标准的主要手段就是“影像诊断「画像診断」”。2月12日，湖北首次运用该标准确诊了1.3万多病例，把中央“应检尽检、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的要求落到了实处，对控制疫情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临床诊断「臨床诊断」毕竟只是诊断新冠肺炎的辅助手段，它无法准确确定新冠肺炎与普通肺炎的区别，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办法，因此在形势稍有缓和之后，2月19日，国家卫健委在“第六版诊疗方案”中，取消了临床诊断标准。这一词汇内涵的变化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其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用，值得铭记。

再如“病毒溯源「ウイルス追跡/ウイルス発生源を突き止める」”一词，本是流行病学调查「疫学調査」工作中的一个正常环节，但由于美国特朗普政权为了掩盖自己在国内的抗疫不力，出于政治考虑，违背世卫组织等在《病毒命名最佳实践原则》中规定的病毒命名不得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相关联的原则，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武漢ウイルス」”，联合个别国家，在溯源问题上企图搞“有罪推定式的国际调查「推定有罪の国際調査」”。因此，“武汉病毒”自不必说，“病毒溯源”一词在一定场合也隐含着特朗普政权企图掩盖抗疫不力责任、转移国际社会视线、甩锅中国「中国に責任を着せる/中国に責任をなすりつける」的政治意图，这是一种“政治病毒「政治ウイル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2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有时表现同一事物，在一种语言中是普通词汇，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是文化负载词。如果用S表示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用T表示译入语中的普通词，S可以等于T，但反过来T未必能与S划等号。由于词汇中特有文化语义的参与，使得二者之间并不具有可逆性。

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我国“加强了口岸防控/入境检疫”，这一词汇译成日语就是「空港や港などの検疫を強化する」，更准确一点就是「入国の検疫を強化する」。当疫情在日本出现时，日本也采取了“口岸防控”措施，它使用了「水際対策」这一表达方式。「水際」本意是陆地与水相接的地方，多用于军事。比如「水際作戦」，其意是“歼敌于水际滩头”。该词也可引申为在港口或机场构筑阻止病原体与害虫进入日本国内的防御体制。也许是为了淡化其军事色彩，2009年在防控世界性新型流感时，日本把强化口岸检疫称为「水際対策」。此次重提该词，就是想借鉴上次的成功经验，把它作为防止疫情向日本国内蔓延的有效手段。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只要在「水際」防控成功，就等于边境口岸防控获得成功。但我国是大陆国家，除了海岸线之外，还有漫长的陆上边境，因此在描述我国口岸防控时，就不宜使用这一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尽管日语的「水際対策」与汉语的“口岸防控”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是相似的，二者等值，但并不等效。

4 相关专业性词汇的翻译

4.1 法律术语的翻译

法律术语有时也是概念性词语，之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些词汇的语义是通过法律条文来限定的。法律条文赋予的语义可称为法律语义，在翻译时，译词必须将隐含的法律语义体现出来。

4.1.1 汉语法律术语的日译

疫情发生之后，我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1月20日国家卫建委发布了1号公告，将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采取防控措施。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是“甲类、乙类”，二是“传染病”，三是“法定传染病”。翻译此类词汇，不能仅仅依靠辞典意义，必须了解相关术语在不同语言中的法律语义或政治语义。

我国对传染病的分类方法与日本不同，我国“法定传染病”原有39种，此次加上新冠肺炎已达40种。其中甲类只有鼠疫和霍乱两种，乙类有非典、艾滋病、狂犬病等27种，丙类有流感、风疹等11种。日本《感染症法》规定的传染病共分5类，

每一类都列出了具体的疾病名称。其中一类和二类均为7种，三类5种，4类和5类数量不定。由于分类不同，所以我国的“甲类、乙类”这类用语宜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成「甲類、乙類」。不过按照日本分类法译为「一類」「二類」，也不会影响我国是按照最高标准对新冠肺炎进行防控的语义传达，无伤大雅。

那么“传染病”能否译成「伝染病」呢？答案是否定的。

汉日辞典上，“传染病”的译词就是「伝染病」。而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词是「感染症」。按照辞典解释，「感染症」指细菌、病菌、寄生虫等病原体进入体内感染而引发的疾病，「感染症」中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才称为「伝染病」，即使感染但并不传染的疾病则不能称为「伝染病」。但是，1998年日本原有的『伝染病予防法』被『感染症の予防及び感染症の患者に対する医療に関する法律』（简称『感染症法』）所取代，新法对「感染症」一词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使之具有了明确的法律意义。该法第6条规定：

>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感染症』とは、一類感染症、二類感染症、三類感染症、四類感染症、五類感染症、新型インフルエンザ等感染症、指定感染症及び新感染症をいう。[5]

从中可以看出，法律中涉及的「感染症」都是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疾病，指的就是“传染病”，旧法中的「伝染病」一词统一被替换为「感染症」。2009年，『旧・学校保険法』中的「学校伝染病」也全部改成「学校感染症」。从那以后，在社会生活中，「感染症」一词也渐渐取代了「伝染病」。而「伝染病」则被『家畜伝染病予防法』赋予了新的法律语义，它已不再用于人类，而只用于家畜。因此，“传染病”一词译成日语时应选用「感染症」这一译词。而我国传染病法中的“法定传染病”也不能译成「法定伝染病」，只能译为「法定感染症」，因为随着1998年旧『伝染病予防法』的废止，日语中「法定伝染病」的法律语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用于人类，而专指『家畜伝染病予防法』第2款规定的「家畜伝染病」[6]。

综上所述，以上几个词汇的日译方案如下：

甲类传染病：「〇甲類感染症△一類感染症×甲類（一類）伝染病」

乙类传染病：「〇乙類感染症△二類感染症×乙類（二類）伝染病」

传染病：「〇感染症×伝染病」

法定传染病：「〇法定感染症×法定伝染病」

4.1.2 日语法律术语的汉译

新冠肺炎在我国是“法定传染病”，在日本则是「指定感染症」。那么，两者是否等值呢？首先肯定的是，两者的法律语义完全不同，它们不具有等值关系。

1月28日日本政府宣布新冠肺炎为「指定感染症」。日本『感染症法』第六条第7款规定：

> 指定感染症とは、既に知られている感染性の疾病（一類感染症、二類感染症及び三類感染症を除く。）であって、第三章から第六章までの規定の全部又は一部を準用しなければ、当該疾病のまん延により国民の生命及び健康に重大な影響を与えるおそれがあ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ものをいう。[7]

由此可知，「指定感染症」是指传染性相当于已知1～3类感染症的新型感染症。它是通过政令指定的，且指定是有时间限制的，通常以一年为期。日本曾于2013年4月颁布过政令将H7N9禽流感确定为「指定感染症」。

根据日本法律，当某种疾病一旦被确定为「指定感染症」，政府就有权要求感染者暂停工作或限制其就业，并要求感染者到指定医院隔离治疗，治疗费用主要由国家负担。如果感染者拒绝，政府则可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机场海关依此规定，可拒绝患有「指定感染症」的旅客入境。此项规定适用于日本境内的所有人员，包括已在日本国内的

外国人，其目的主要是防控疫情蔓延。日本刚刚宣布新冠肺炎为「指定感染症」时，我国国内部分网民误以为新冠肺炎患者可以到日本接受免费治疗。可以说，这是对词汇内涵理解缺失导致交际障碍的一个典型语言学事例。

关于「指定感染症」这一词汇的翻译，起初由于对其法律语义了解不深，将其译为“特定感染症”，但在了解其法律内涵后，还是照搬其汉字，直译为“指定感染症”。

诸如此类具有法律语义的词汇，在翻译时，不管是采取同化策略，还是采取异化策略，最重要的是要保留各自在原语中的法律语义。

4.2 机构名称的翻译

机构名称通常采取直译方式。对于有些著名机构，在翻译时可沿用已有的最常见译法，以保持与过去的兼容。比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因为过去就有「中国赤十字会」的说法，如果硬要把“总”字翻出来，反而不自然。而“中国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监察委员会”等机构名称，则可以采用字字对应的直译法，分别译成「中国の国家衛生健康委員会」「中国疾病管理予防センター」「国家監察委員会」。

临时机构名称的翻译可视情况而定，根据译入语受众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这是我国政府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紧急启动的多部委工作协调机制，是一个临时机构。该词如果出现在政府公文中，就采取异化策略，译成「国務院協同予防・抑制メカニズム」。因为政府公文日译本的受众不是普通民众，基本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采取异化译法，能把他们带入汉语的政治语境之中，使他们更好地感受到此类词汇所承载的政治文化信息。但是如果是新闻报道或情况介绍类文章，因其受众是普通民众，异化译法则会使他们如坠雾中而不知所云，因此宜采取同化译法，译成「国務院合同対策本部」。这样翻译，既体现了该机构高层次的国家属性，又体现了它是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指挥协调机构，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通俗易懂，达到了信息传递的目的。

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一词的译法可以看出，异化译法注重的是语言的等值，而归化译法注重的是语言的等效。

4.3 缩略语的翻译

缩略语具有高度凝练、表达简洁、容易记忆、冲击力强等特点，但在译入语中，由于受众不了解其背后省略的成分与压缩的语义，如果仅仅进行逐词对译，则很难把原语高度概括的语义表达出来。因此，翻译缩略语，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的方法。

比如，各地在抗击疫情时，均要求“落实‘四类人员’管理措施”。“四类人员”指“隐性感染者、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如果仅仅翻译成「4種類の人間に対する管理措置を徹底する」，则没有达到将具体抗疫措施传达出去的目的。因此加上解释性词语，把“四类人员”译成「4種類の人間（無症状感染者、濃厚接触者、感染の疑いがある患者、確定感染者）」，这样就可弥补原语中被压缩的语义。其中，“隐性感染者”在疫情刚刚暴发时，译成「不顕性感染者」，随着对疫情认识的加深，渐渐把“隐性感染者”与“无症状感染者”归为一类，统一译成「無症状感染者」。另外，“密切接触者”属于防疫学专业术语，不能译为「密接接触者」，按照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定义，只能译成「濃厚接触者」。

同样，日语缩略语译成汉语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比如，日本在抗击疫情中出现的「三密」一词也是缩略语。日语中的「三密」原本是佛教用语，指佛主的“身密、口密和意密”。但此次作为防控措施提出的「三密」则不同，它是「密閉、密集、密接」3个词的缩略形式。日本认为夜间至凌晨营业的酒吧、餐馆、娱乐场所等，大多同时具备通风不好的密闭空间、人员密集、近距离密切对话等特

点，是感染的高发地，因此，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国民避免前往「三密」场所。所以，「三密」译成汉语，至少应该译成“三密（密闭空间、人员密集、近距离密切对话）”。

4.4 生僻专业术语的翻译

专业术语在日常生活中原本就不常用，而生僻的专业术语翻译起来就更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而且现有辞典基本没有收录。在此次疫情中，有些莫测高深的生僻专业术语因其在防疫中的重要作用而广为人知，成为热词。翻译这类专业性很强的词汇，通常的办法是依靠网页进行检索，但特别生僻的词汇即使上网检索，也未必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比如“核酸检测”一词，2月份刚刚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无论中文网站还是日文网站，不仅出现频次极低，而且解释过于专业，晦涩难懂。“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出现大面积感染之后，日本媒体上开始出现「PCR検査」一词。通过网络检索，该词的意义为“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日语叫做「ポリメラーゼ連鎖反応」。仅靠这些信息，尚无法断定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经反复查找资料并请教专业人员，得知核酸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的总称，它是生物体的遗传物质，每种病毒的核酸都不相同。通过检测致病微生物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或者RNA（核糖核酸）的基因序列（遺伝子配列），就可明确感染病毒的种类。其检测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使DNA扩增的PCR检测法，一种是使RNA扩增的MTD检测法。此次疫情中核酸检测使用的是PCR检测法。由于最初不了解该词的内涵，将其直译成「核酸検査」，但对日语网页进行检索，并没有发现该词，不过有「核酸増幅検査」的说法。译成「核酸検査」只是权宜之计，译成「核酸増幅検査」虽然没有错误，但受众极小。随着对核酸检测认识的加深，译成「PCR検査」，既准确地传达了语义，也保留了该词在原语与译入语中的热词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词汇内涵了解越深，选定的译词就越准确。

另外，网页检索法也是难词、新词翻译的重要手段。通过网页检索，还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术语的表达方式。在检索“核酸检测”的过程中，一些相关术语的翻译也迎刃而解，比如：

试剂盒：「検査キット」

检测试剂：「検査用の試薬」

检测样本：「検体（けんたい）」

咽拭子：「咽頭ぬぐい液（いんとうぬぐいえき）」

鼻拭子：「鼻腔ぬぐい液（びくうぬぐいえき）」

复阳：「再陽性」

抗原检测（检测体内现在是否有病毒）：「抗原検査」

抗体检测（检测感染后血液内是否存在抗体，即过去是否感染过）：「抗体検査」

4.5 药品名称的翻译

新冠病毒作为新型病毒，目前虽没有特效药，但各国都在进行相关药物的临床试验。了解这些药品名称对翻译人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些药品大多不是常用药，即使是医务工作者，如果不是相关专业的专科医生，也很难接触到。把这些词汇的中外对照列出来，对于加强国际合作、抗击疫情，以及进行学术交流，将会提供一个便捷的参考。

这些药品名称彼此独立存在于原语与译入语中，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寻找它们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必须绝对准确，不能有半点差错。为此在网络检索时引入英语作为第三方参照，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些药品比较生僻，不少是新药，所以无论在汉语网页还是日语网页中，它们后面大多会有英语标注，这就为我们准确翻译这类词汇提供了一个桥梁。应急词汇库中共收录了50余种药品名称，这些词汇佶屈聱牙，不易记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请中国专业播音人员和日本友人分别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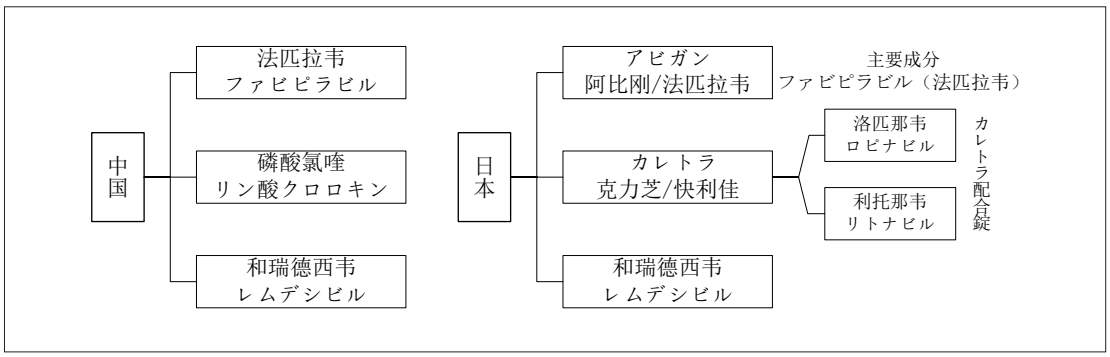
与日本将单词录音，然后通过音频编辑软件将两者进行合成，方便翻译人员通过声音进行记忆。

中日两国的临床试验西药有很多种，从图2可以看出，主要的试验药物各有3种，其中有两种相同，只是名称有所区别。我国的3种临床试验西药是法匹拉韦「ファビピラビル」、磷酸氯喹「リン酸クロロキン」和瑞德西韦「レムデシビル」。日本的是「アビガン」、「カレトラ」和「レムデシビル」。其中，「アビガン」是日本用于治疗新型流感的战略储备药。「アビガン」是商品名，其主要成份是「ファビピラビル」（法匹拉韦），所以在我国将其称为“法匹拉韦”。该药在俄罗斯仿制后，则称为“阿维法韦「アビファビル」”。「カレトラ」的全称是「カレトラ配合錠」，是一种HIV蛋白酶抑制剂「プロテアーゼ阻害薬」，主要成分是洛匹那韦「ロピナビル」和利托那韦「リトナビル」，中文译名有两个，一个是“克力芝”，另一个是“快利佳”。对于专业翻译人员来说，记住语言符号的对应关系是基本要求，如果能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能进一步提高翻译的准确率和效率。

5 疫情通报用语与防控措施相关词组的翻译

5.1 疫情通报用语的翻译

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于1月20日启动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每天进行疫情通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重症患者、死亡人数”是通报必不可少的内容。这种通报也体现了我国政府的信息公开与透明。上述几个词在疫情发生之前都是比较生冷的词组，因此，刚开始采取了词词对应的直译方法，即把每个词都翻译出来。比如“新增”译为「新たな/新規」，“确诊”译为「確認/確定」，“病例”译为「症例」。“新增确诊病例”就译成了「新たなに感染が確認された症例」或者「新たな確定症例」。这种词词对应的翻译方式，其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语义流失，但缺点是比较繁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尤其是在口译中。在语境缺失的情况下，这种繁琐的表达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融入了使用这些词汇的语境之后，就会形成对语言理解的某种默契，表达也就越来越简洁。在疫情通报这个特殊语境中，“病例”就是指「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者」，而「感染者」就是“已经确诊的患者”。语境越明确，语义就越向核心词素聚焦，就越呈现出向口语化过渡的特征。“新增病例”就可译为「新たな感染者」或者「新規感染者」，甚至直接译为「感染者」。“死亡病例”也由「死亡症例」逐渐变为「死亡者」，或者进一步口语化，译成「亡くなった方」。进入3月底，在我国国内疫情相对稳定之时，境外输入病例开始增加，所以在通报中，又增加了“本土病例”和“境外输入病例”两个指标。“本土”可直译成「本土」，也可译成「国内」。这些疫情



注：“法匹拉韦”译成日语是「ファビピラビル」，在日本多用商品名「アビガン」，俄罗斯仿制后，则称为“阿维法韦”，译成日语是「アビファビル」。作者自制。

图2 中日主要临床试验西药

通报用语的翻译大部分都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变化过程，具体如下：

确诊病例：「感染が確認された症例→確認症例/確定症例→確定感染者→感染者」

疑似病例：「疑似症例→感染が疑われる患者→疑いのある患者（人）」

新增病例：「新たなに感染が確認された症例→新たな確定症例→新たな感染者/新規感染者」

重症患者：「重症の患者/症状の重い患者→重症者」

重危患者：「重篤な患者」

轻症患者：「軽症の患者→軽症者」

治愈出院：「治癒して退院した人→症状が回復して退院した人」

本土病例：「本土の感染者/国内の感染者」

境外输入病例：「海外からの輸入感染症例→海外からの感染者」

5.2　防控措施相关词组的翻译

我国的抗疫措施多以词组形式出现，常使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对仗工整，简洁明快。把这些词组翻译好，有助于向世界传递我国抗疫的成功经验。不少词组是以带数字的缩略语形式出现的，其翻译方法可参照前述缩略语“直译加解释”的译法，而有些由同一词汇引领的排比结构，是典型的汉语表达方式，如果把引领词全部译出，在日语中则比较啰嗦。因此对于这类排比结构，翻译时采用只使用一个引领词的译法。总之，此类词组的翻译，既要保持语言的凝练，也要保持语义的准确。比如：

“四早原则（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早期発見・報告・隔離・治療」）の原則」

“四个集中（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患者と専門家と資源と治療を集中させる原則」

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最も全面的で厳格かつ徹底的な感染防止措置」

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隔離すべきは隔離し、収容すべきは収容し、検査すべきは検査し、治療すべきは治療する」

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共同予防· 抑制メカニズム、共同防止· 管理システム/共同の予防· 抑制の措置」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外部からの流入を防ぎ、内部のぶり返しを防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外国からの流入を防ぎ、国内の再発を防ぐ」

6　结　　语

在翻译整理新冠病毒相关词汇的过程中，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建立应急语言保障词汇库对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性。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伊始就迅速建立一个中外互译的基本词汇库，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此次，我们建立的“新冠疫情应急中日对译词汇库”，尽管时间仓促，译词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它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希望此次词汇库的建立，能为今后建立重大突发事件应急语言保障词汇库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注

[1] 现代汉语辞典（2002年增补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44.
[2] 许钧.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41.
[3] 谭载喜编译.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31.
[4]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2：34.
[5] 感染症の予防及び感染症の患者に対する医療に関する法律[EB/OL] [2020-06-10].https://www.mhlw.go.jp/web/ t_doc?dataId=79998826&dataType=0&pageNo=1.
[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法定伝染病[2020-06-10].

[7] 感染症の予防及び感染症の患者に対する医療に関する法律[EB/OL][2020-06-10].

参考文献

修刚，李运博.十九大报告翻译实践与中央文献的日文翻译策略[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一至第七版）[EB/OL][2020-06-10].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new_list.shtml.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ついて[EB/OL][2020-06-10].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html.

人民网日文版转载《新型冠状病毒中日互译300词》[EB/OL][2020-06-10].https：//mp.weixin.qq.com/s/8DdSK94jfRiWw2d7MbeWXA.

作者简介：孙成岗（1965—） 男 汉族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研究、日语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scgwh126@sina.com

作者简介：吴宏（1968—） 女 汉族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研究

联系方式：gokouwh@126.com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Japanese Emergency Terminology Corpu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bstract: The context formed by major emergencies often adjusts the conceptual meaning of terminologies to some extent, and endows them with certain relevance or situational semantics. This paper, tak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s the background, briefly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a Chinese-Japanese emergency terminology corpus, investigates the related vocabulary in the context of this epidemic, analyzes the semantic changes caused, and discuss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words based on the situ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examples and a reference for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Chinese-foreign emergency terminology corpora in major emergenc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VID-19 epidemic; emergency terminology corpus; Chinese-Japanese translation; construction assumption

Authors' Information:

Sun Chenggang (Male) Year of Birth: 1965

Professor at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E-mail: scgwh126@sina.com

Wu Ho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68

Professor at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China

Japanese Linguistics

E-mail: gokouwh@126.com